

Tang Wenquan Wenji

唐文权文集



唐文权 著

学术文库

学出版社



Tanquān Wénjī
唐文权文集

唐文权文集

唐文权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文权文集/唐文权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22-6136-0

I. ①唐… II. ①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067 号



唐文权文集

© 唐文权 著

责任编辑: 陈良军

责任校对: 王 胜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550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定价: 75.00 元

封面设计: 甘 英

封面制作: 胡 灿

电话: 027-67863220

电子邮箱: hscbs@public.wh.hb.cn

督印: 章光琼

印张: 32.25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言

岁月如歌，人生如梦。文权离开人世，即将 20 年。

他病逝于 1993 年 10 月 27 日，当时我正在台北政治大学教书，未能与挚友最后诀别。接到讣告已是 12 月 4 日，次日曾有日记，已收录于《鸿爪集》“萍踪篇”。原文是：

12 月 5 日星期日，阴

昨日接唐文权讣告，并附临终手书一纸：“西行求法，寒窗十载；导引之恩，永世不忘。”他原任教于苏州市二中，“文革”后期因研究章太炎与我通信论学，给我深刻印象。1980 年元旦，我因看苏州档案馆相关文献，与他初次见面并承蒙留宿家中。朝夕相处，了解渐深，知其为读书种子，学术有望可成大器，经多方努力，克服重重成见（非大学本科毕业），终于 1983 年调来我校，至今恰好“十载”。英年早逝，尘缘已尽，终成一别，伤哉！夜不成寐，辗转反侧，晨起草拟挽联：“姑苏结交，江汉论学，风义兼师友，人间难得有此知己；以研章始，以评陶终，清誉传中外，苍天何不假之以年？”（“研章”指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一书，“评陶”指曾被列入 100 本优秀青年读物并获全国陶行知研究一等奖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学术传记）。

往事虽然非烟，但记忆早已模糊。我已记不清与文权首次通信的时间与具体情境，估计应该是在 1975 年春夏之间，当时我尚在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历史研究》1974 年复刊初期，我曾经奉命赶写一篇评论章太炎的文章，并向中华书局的前辈学人马宗霍先生登门求教，其成果便是以黎跃章为笔名的《论〈诂书〉》一文，聊以为“评法批儒”交差。但 1975 年春夏之交情况有所变化，邓小平的复出与整顿之风兴起给人们带来新的期望，而《历史研究》杂志已预定要交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主编仍由黎澍担任，可说是“物归其主”。同时，我已决心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回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书并就近

照顾家人。正因为如此，文权写信给我，倒不是想发表什么“评法批儒”文章，而是真正想对章太炎做长期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此以前他已经就近结识研究章太炎成绩斐然的汤志钧，并且按照志钧的建议，把章太炎的一生分成若干时期，利用图书馆的索引卡片逐部逐篇地认真研读章太炎的原著。这种做学问的路径在“文革”期间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也正因此而受到感动，所以便不断与这位陌生的青年学者交流治学心得，即使回武汉以后通信也未中断。

但是两人正式见面却是在四五年以后，那是由于我已决定要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一篇论文，即《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在资料查阅期间，主要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但是又不满足于上海一地的收藏，于是便把眼光扩大到江浙两省，而首先便集中于苏州，因而便必然要借助土生土长的文权作为向导。由于通信已有多数，所以更加一见如故，文权执意要我住在他家，我也毫不客气地欣然同意。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这样便于两人每天结伴出行，并且有利于及时商议工作。住宅是老城区一所老式民屋，两层楼房，业已破旧。一进门就是共用的客厅，楼梯窄而且陡，文权租用的是二楼左侧两间相连的侧屋，并且把原有的过街楼（通道）改造成一间小巧玲珑的书房兼充客房。两个儿子住靠近楼梯那间房，文权夫妇合住一间，在当时来说倒也不算狭窄，至少比我的住房条件还略好一点。但缺点是客房没有单独的通道，必须穿过主人的卧室才能下楼。再就是苏州老式居民的共同缺点，没有专用的厕所，每家必须自备马桶。公用的厨房也在楼下，只能在空空荡荡、冷风袭人的客厅进餐。回想起来，文权夫妇每天为保证可口且热乎乎的饭菜，真不知花费多少精力。

但当时似乎全不在意这些日常生活的艰辛，因为大家的心思都集注于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而且一进苏州市档案馆就如同发现一座宝藏。苏州商会档案卷帙浩繁，珍贵无比，特别是市民公社和商团档案的完整全宗，使我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其时正值寒冬腊月，姑苏已是银妆素裹，但我们哪有心思观赏山水园林之美，整天涵泳于史学探索之乐。紧接着，我们又在邻近的吴江、常熟等地，发现大批珍贵档案、文献与罕见的书刊。最终，文权夫妇把我送上苏杭运河的夜航船，伴随着诗意盎然的江南梦境到达杭州，又开始捕捉清末民初浙江商人的历史踪迹。

苏州之行大大加深了我与文权的相互理解，我已直觉地认定他是可造之材，他则似乎已经确定了终生师从的目标。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昌隆重举行，文权不负众望，经论文评选成为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外仅有的两位青年学者之一（另一位是陕西张应超），参加了这次盛会。而在

此前后，他已经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即《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国哲学》1982年第8期）。当时能够从佛学角度探讨章太炎思想者为数不多，他的学术功力与研究深度，自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文权在武昌开会期间已经明确表达了从我治学的决心，所以会后我就请学校正式发商调函。苏州市教育局及时回复同意，但却受阻于华中师范学院当时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理由是文权只读过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更加看好，但丝毫未能说服这些呆板的当权者。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他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文权之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解放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们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虽然已经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实际上师资队伍仍然比较薄弱，1983年春文权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苏州，举家迁汉来华中师范学院任教，他自谦说是“西行求法”，而对我们真是及时的援助，明显地充实了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实力。文权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大学教学的环境，而且非常敬业乐群，善于与同事合作进行学术研究。首先是与罗福惠合作，于1986年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接着又写成并出版《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为我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大为增色。他与校外的资深学者也有多项重要合作，如与卞孝萱共同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协助汤志钧校辑《梁启超全集》，并为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撰写《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并被引用。

文权留给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最重要的遗产，应该是至今仍在持续编辑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他不仅为这套丛书设定体例，周密规划，而且花费大量精力寻访稿源，筹集资助，审校书稿。他率先编辑出版《雷铁崖集》，随后又与桑兵合编《戴季陶集（1909—1920）》，促使这套丛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响极大的品牌之一。去年近代史研究所隆重推出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又将这套丛书全部收入重新出版，正好满足众多读者的热切需

要。抚今思昔，我不能不怀念文权披荆斩棘的开辟之功。

华中师范大学是率先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并成立陶行知研究室的先进单位，但惭愧的是我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对陶行知却未抓紧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廖鹰校长职务以后，教育部相关领导为了协调全国“陶研”工作，提高“陶研”学术层次，命我亲自参与陶行知研究的全盘推进。面对许多“陶研”先进人士，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陶公生前亲自培养调教的干才，如今多已成为高层领导，我内心的惶恐真是难以言说。幸好这些老前辈、老领导热情提携后进，平易近人，亲如一家，果真体现陶氏门风。我除参与“陶研”整体计议外，决心做两件事力求成为表率。一是培养中国第一个“陶研博士”，二是写一本陶行知学术评传。幸好选材得当，第一个“陶研博士”经由周洪宇的勤奋治学而实现，博得海内外同行学人的共同认可。至于写传，本来我就有继《张謇传稿》的出版之后，再写一部陶行知评传的想法，但学校行政事务的繁杂，再加上1989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使我实在无法潜心撰著。幸好又有文权见义勇为，与我共同承担此项重任。1990年8月我辞去校长职务，并且应邀赴美研究、教学多年，陶行知传记的写作主要只能靠文权执笔完成，而我无非是个“通信”编审。文权为此书耗尽心血，不仅查阅了大量报刊、文献、书籍，而且对陶公众多家庭成员与门生故旧做了极为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他在《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出版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在两历寒暑终于脱出书稿之后，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这部书稿完成于1990年岁末，1992年3月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出版社还在扉页上说明：“当然，对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们也不尽赞同，学术界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当时文权在国内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而“寻找真正的陶行知”，讲点真话与发表若干新的见解是多么困难。但此书出版以后好评如潮，特别是在为数众多的“陶研”同行中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对于文权与我是莫大的安慰。

文权本来可以有更多作为与更大贡献，但正如前人诗云：“人事天心两相违”，不过53岁便因患不治之症病逝于苏州，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怆。为纪念文权来我所工作10年及逝世20周年，同事诸君决定编辑出版一本文集。编者要我写序，天寒岁暮，杂事丛集，写写停停，直至今日才能交卷。老来文思枯涩，只能就忆念所及，缅怀故人的可贵业绩与深挚友情而已。

章开沅

壬辰岁末于桂子山

目 录

读章太炎《诂书》	1
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思想演变	9
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	21
章太炎“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解	33
陶成章略论	40
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	59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	72
章太炎与邹容——兼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104
梁启超佛学思想述评	123
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	145
反思的历史和对历史的反思及其它——章开沅中国近代史论文读后	166
熊十力《乾坤衍》探微	179
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	192
鹃因口瘁啼衔赤——《雷铁厓集》前言	211
二十世纪初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东渐述论	221
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	251
杨度与清末立宪运动散论	263
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	272
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	283
甘地两次不合作运动在当年中国的反响	295
新视角下的得与失——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关辛亥革命部分	304
近代中外经济联系加强对苏南农村的影响	321
“五四”精神：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330
同光之际中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与苏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	345

人口忧思百年录	356
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	361
梁启超在戊戌壬寅期间的西学宣传	385
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的西学宣传	416
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	428
二十世纪初文化人类学东渐述论	434
杨文会与清末佛教革新运动	447
陶行知与江青	482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487
附录：芦花又纷飞——祭唐文权教授	497

读章太炎《诂书》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曾以一个反帝反封建战士的姿态出现，对推动革命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诂书》是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写的第一部重要政论集。

《诂书》在一九〇〇年初版于苏州。在此之前，章太炎参加了维新运动，因而这部书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是，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促使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九〇〇年开始，他在被清政府追捕的情况下，陆续对《诂书》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〇四年出了新版。新版《诂书》把初版的五十篇文章删去一半，增写了很多新作，共收六十五篇文章，约十万字。这部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保皇立宪派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产物，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领域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它鲜明地表达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以求得国家的独立和民主的强烈愿望，无愧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一篇檄文。

一

《诂书》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书。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被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帝国主义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项又一项的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腐朽反动的清朝政府和保皇立宪派奉行投降卖国路线，扬言“宁赠友邦，勿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完全堕落为帝国主

义的走狗。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精神，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阻止了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野心的实现。章太炎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为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图资产阶级之生存，大声疾呼，奋起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随着一次严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它们扩军备战，妄图用武力来重新分割世界。一八九八年，老沙皇由于军费开支庞大，陷入财政困难，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对外继续争夺霸权，发起“裁军会议”。章太炎在同年春天写下了《弭兵难》一文，强烈谴责沙俄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其他弱小国家的侵略，揭露老沙皇发起的“裁军会议”是假裁军，真侵略；揭露帝国主义采用政治讹诈和军事侵略的反革命两手，或“持哀的迈敦书以索地”，或出动警察、军队实行武装占领。他尖锐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是“群盗”、“虎狼”，他们口念“弭兵”经，却“必不肯弭兵于中国”。在世界上还存在强国和弱国的时候，“弭兵”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琦辞”，欺世惑众的“仁术”，只能给“强国”以侵略扩张的口实，而“弱国”根本无从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俄、美两国把“弭兵”吹得天花乱坠，然而，墨写的谎言岂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就在一八九八年，美国同西班牙为了争夺古巴、菲律宾等殖民地，爆发了美西战争；一九〇四年，沙俄与日本为分割我东北领土、争夺东亚霸权，爆发了日俄战争。今天，在美、苏两霸故伎重演、玩弄“裁军”的时候，重读章太炎在七十七年前写的《弭兵难》，不能不发人深省。

章太炎揭露并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罪行。他把矛头直指一小撮主宰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垄断资本家，揭露他们操纵国际金融市场，以卑劣的手段掠夺中国的白银：“西方之金一两，当银十五两。其与吾易，则当三十两，所得倍称。故泰西隐益，而中国隐损。”^① 卑劣的掠夺使“中国金币之泄于异域者，不可画著计”^②。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驯佞”，大量掠夺中国的粮食，“转漕于海外，岁一二百万石”，造成了中国农民虽粮（丰年）还以“凝土（观音土）”充饥的惨剧^③。对深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压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章太炎深表同情。

① 章炳麟：《馥书·制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2页。

② 章炳麟：《馥书·明农》，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7页。

③ 章炳麟：《馥书·消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46页。

他控诉垄断资本依仗“治外法权”打击迫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罪行：“通商之岸，戎夏相拌，一有贼杀，则华人必论死，而欧美多生。”^①通过这些材料，章太炎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血腥侵略的历史案卷。它证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从它出世的那天起，就浸透了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血汗。它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

章太炎还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和孔孟之道作为侵华、亡华的工具。一八七〇年，天津人民愤怒地痛击以传教为名的帝国主义分子，焚烧教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当时的直隶总督大卖国贼曾国藩却为虎作伥，用中国人民的鲜血向洋主子献媚。章太炎以严峻的史笔记下了中外反动派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天津民众，聚击圣象，论诛十五人。”^②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历数芜湖、古田、曹州等“教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分子的“恣横”不法，引起中国人民“积忿结气，怨之衔骨”而奋起反抗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教案”“以割吾地”的阴谋，而卖国的清朝政府却总是献媚屈膝于帝国主义。章太炎指出，如果让那些传教士利用孔丘的“遗计”和“经纬”，“以号于众”，“若是则西教愈杀也”。舶来的“洋烟”加上老牌的“土膏”，两把软刀子并用，一起杀人，中国就真“阡危”到极点了。章太炎对帝国主义的无情揭露，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人。

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章太炎极力主张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神州之商，潼渤蔚荟，相集相错，以成大群，而后可与西商格拒”，“然而非革命者，犹若不能行也”^③。章太炎大声疾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像云水那样相集，联合起来对抗垄断资本的涌入；号召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改变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民族利益，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④。因此，他始终提不出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① 章炳麟：《馥书·定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5页。

② 章炳麟：《馥书·忧教》，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2页。

③ 章炳麟：《馥书·制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2页。

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第14页。

二

《愬书》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史上的一块丰碑。

《愬书》从旧版到新版的变化，生动记载了像章太炎这样一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投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过程。在初版《愬书》中，他曾主张“变革故法”，调和国内阶级矛盾，“以御白人之侮”，避免正在斗争着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这两头“犖牛”（大雄牛）被帝国主义这头“玄熊”同时吞噬的亡国惨祸^①。但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九〇〇年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被镇压和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浪潮的新高涨，促使章太炎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新版《愬书》中，章太炎否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表现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政治立场。目录前的两篇文章《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就是对改良主义思想进行公开严肃的自我批判。他沉痛地承认，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违于形势远矣”，不推翻“色厉中干”、“蕙畏”洋人的封建统治者，中国最终只能沦为“欧美之陪隶”。要救国，只有寄希望于“新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②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愬书》中，对清朝政府的反动专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批判。

章太炎愤怒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罪行。他揭露号称富庶文明的苏州地区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指出官僚地主阡陌相连，“农夫占田寡，而为庸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③。他痛斥清朝统治者的“不加赋”、“政仁”、“泽厚”的欺骗宣传，指出他们对农民和商人的横征暴敛，比明火执仗进行“劫略”的强盗还厉害。章太炎称这帮大大小小的剥削者为寄生虫，指出在他们的残酷压榨下，中国“纵不时毙，其筋力固以日弛”；他们榨取了中国人民

① 章炳麟：《愬书·客帝》前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按语，《毛泽东宣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第138页。

③ 章炳麟：《愬书·定版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0页。

的血汗去供奉帝国主义的需索赔款，奴才敲剥无度，主子欲壑难填，“罄折徒跣以承白人之鞭怒”^①。在《定版籍》中，章太炎记录了自己与孙中山关于改革土地制度的一番讨论，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经济纲领。他批判封建生产关系不合理，必然造成“贫富斗绝”，引起陈胜“张楚于大泽”这样的革命。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封建生产关系，从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章太炎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他又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合理的，赞同这样的看法：拉车工人与航海船主，建筑工人与艺术家，一为“牛马”，一为“宗主”，他们的经济收入理应相差百倍，“岂可同哉”，“欲均贫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

章太炎还用他锋利的笔戳穿了封建统治者玩弄“君主立宪”的政治骗局。在《消极》中，他尖锐地揭露他们变法是真，卖国是真。“清作伪政”，只是为“媚大邦”、“使国鬻”。他们标榜“强兵”，只为镇压革命，“不以御外，以御其民”。因为这伙卖国贼深谙“得失之数”：“民胜者，位号亡；外胜者，位号存。”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封建统治完蛋之时，若是帝国主义打进来，他们还可以保存儿皇帝的资格。因此，章太炎断言，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清除清朝反动统治这一“害柢”，才能采用“积极之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就像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变革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一样，《馥书》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理论准备。章太炎总结了中国历代尊法反儒政治家的“法治”经验，并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精心勾画了一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蓝图。在《地治》和《刑官》中，他介绍了西方的“联邦制”、“联州制”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官统（下）》中，更具体地提出了“置议院”、“求材于学”、“相材而授之职”等“六术”，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政治纲领。《馥书》中还有很多篇目如《定律》、《明农》、《经武》、《议学》、《相宅》等，分别从法律、经济、军事、教育乃至革命成功后的建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吾言变革布新法，皆为后王立制。”^② 纵然这张蓝图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而且在中国也极不现实，但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之前，也算得上一张令中国资产阶级神往的蓝图了。

① 章炳麟：《馥书·不加赋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6页。

② 章炳麟：《馥书·消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45页。

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①。章太炎虽说推翻清朝统治是“耕夫红（工）女，将与有责”^②，但却轻视和脱离人民群众，认为在全中国四万万人中，懂得革命道理的“亿不盈一”^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发动作为民主革命主力的广大“耕夫红女”起来进行斗争，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彻底铲除，当然也就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章太炎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

《馗书》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声讨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

章太炎激烈抨击孔孟之道是守旧复辟之道，孔孟之徒是“污邪诈伪”之徒。在《订孔》中，他把矛头直指孔子，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说孔丘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守旧”，“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在《争教》中，他揭露了儒家所“黽言”的孔丘把法家先驱者少正卯“执而杀之东观之下”的事实。指出，少正卯的革新活动同孔子的守旧倒退路线是一场激烈的水火不相容的“争教”即路线斗争。在《学变》、《学蛊》、《王学》、《清儒》、《学隐》等篇中，章太炎对从董仲舒到宋元明清理学的儒家代表人物和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揭露董仲舒宣扬孔孟之道，“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④，痛斥宋代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蛊民之学者”^⑤，明代王守仁支离破碎的“学术”，“徒以济诈”^⑥，清代曾国藩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凶”和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善变人”^⑦。章太炎着重总结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儒家斗争，从提倡变革的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馗书》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兵》等篇，都论述了我国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大转变时期的思想政治路线斗争。论古是为了议今，章太炎的反儒带有鲜明的阶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② 章炳麟：《馗书·原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页。

③ 章炳麟：《馗书·解辨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3页。

④ 章炳麟：《馗书·学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⑤ 章炳麟：《馗书·学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页。

⑥ 章炳麟：《馗书·王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4页。

⑦ 章炳麟：《馗书·杂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4页。

级和时代特征。他把一个个孔孟之徒的丑恶嘴脸揭露出来，正是为了痛击那个自称“长素”（长于“素王”孔丘），为门徒题号“超回”、“轶赐”（超过颜回、子贡）的“南海圣人”康有为。他总结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儒法斗争，正是为自己那个历史大变动时代的阶级斗争服务的。

章太炎热情颂扬了秦始皇和商鞅等著名人物，高度评价他们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革命措施。他以极其蔑视的态度嘲讽保皇派：“今之儒者，闻管（仲）、商（鞅）之术则震栗色变。”^①在《商鞅》中，他对“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一事表示极大的愤慨，痛斥“非议法家”、“自谓近于维新”的康有为为之流对商鞅的攻击。他充分肯定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认为商鞅严惩躲在幕后教唆太子破坏变法的公子虔，镇压七百余反对变法的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革命措施，就像牧人“无所吝”地清除牛羊中的败群瘟畜。章太炎认为，如不这样，就不可能出现秦国“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的局面。对保皇派从历代反动派那里拣来的“法家亡秦论”，章太炎在《刑官》一文中痛加驳斥。他指出，恰恰与这种谬论相反，秦因为“不能自守其宪度”，“故赵高得报之”，“恣己意以族大臣”，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这才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章太炎鲜明地指出，如果秦王朝不是乱法，“何（赵）高之足患”。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公开勇敢地为秦始皇申辩的革命言论。值得指出的是，章太炎就在总结秦以法乱而亡的历史教训的差不多同时，写下了《秦政记》和《秦献记》这两篇著名的史论，论证了秦始皇以法治兴秦国的历史经验。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为了强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馗书》在评论法家人物时，十分强调法治思想。他充分肯定管仲的“以刑名整齐国”^②，曹操的“任法”^③，诸葛亮的“齐人心，壹法令”，克服“内讧”“分裂”“魁柄下移”的政治措施^④。

章太炎还继承法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并运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批判了保皇派鼓吹的“天命论”。“人死而为枯骼，其血之转磷或为茅蒐，其炭其盐或流于卉木，其铁在矿，其肌肉或为虫蛾蛭豕。”^⑤这就是说，人死后，构成人体的

① 章炳麟：《馗书·儒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② 章炳麟：《馗书·儒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③ 章炳麟：《馗书·学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2页。

④ 章炳麟：《馗书·正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2页。

⑤ 章炳麟：《馗书·原教（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4页。

血液、炭、盐、铁、肌肉等成分，经过化学分解转化为磷，或者为草木等植物吸收，或者为虫蛾蛭豸等昆虫动物吮食，或者变为矿物质。这就有力地批判了鬼神上帝等迷信的虚妄。章太炎还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人类与生物的进化，“猥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①。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人类还得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物苟有志疆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②

在差不多与《馗书》同时写下的《革天》一文中，章太炎在我国古代“人定胜天”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定代天”和“人定革天”的思想，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的蓬勃朝气。他们不信天命信人力，要“与天地竞”，奋发图强，争取自己政治上的解放，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章太炎的战斗文章，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但是，章太炎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越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在思想上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因此，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章太炎尽管同复辟逆流进行了斗争，但在一九一四年再次修订《馗书》并改名为《检论》时，却删去了很多宣传革命的内容，增加了不少纯学术研究的文章，明显地反映了他思想的倒退。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③这就证明，当一种新的剥削阶级专政代替另一种剥削阶级专政的时候，必然要遭到旧制度、旧思想的猛烈反抗，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

[原载《思想战线》1975年第4期]

① 章炳麟：《馗书·原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8页。

② 章炳麟：《馗书·原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7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第41页。